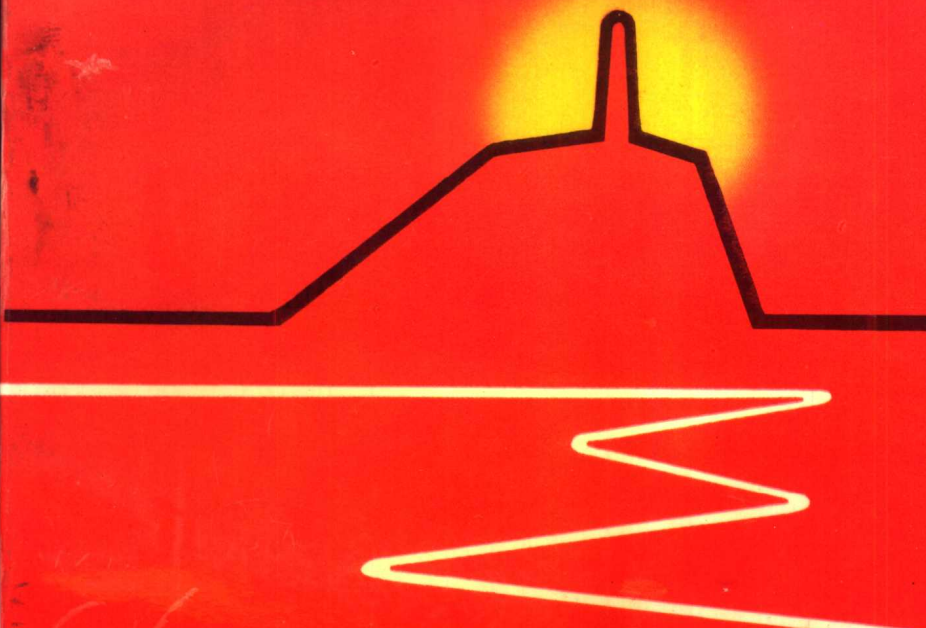


张俊波 王禄林

焦连三 张远葆

A stylized graphic on a red background. It features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mountain with a sharp peak. Behind the peak is a bright yellow sun. A white zigzag line, resembling a lightning bolt or a stylized path, extends from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

迟雪岁月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延安岁月

张俊波 王禄林

焦连三 张远葆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三月

延安岁月

解放军出版社

延 安 岁 月

张俊波 王禄林 焦连三 张远葆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152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西安)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85—1390—0/K·113

定 价：3.00元

社编号 2—067

出 版 说 明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视察延安时，号召全党全国要进一步发扬延安精神。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上将在接见西安地区军队领导时，赞扬了一些军队院校长期坚持延安革命传统教学的做法。为了使延安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我们编写了《延安岁月》一书。

《延安岁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着重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苦岁月里的革命情怀和精神风貌，热情讴歌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白求恩、张思德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伟大人格，充分展示了延安时期的伟大时代精神，是一本进行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的教材。

本书的许多宝贵资料由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在附录部分收录了王敬宇撰写的延安概况和黄陵简介。

陆恂少将为本书的特邀编审，他作了认真的审阅和修改，并写了序言。

本书承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中将题写书名，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疏漏之处难以避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2月15日

时代需要延安精神 人民呼唤延安精神

(代序)

陆 恂

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谱写着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辉煌而壮丽的篇章，凝聚着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铭刻着一代开拓者的丰富智慧和宏伟业绩，蕴藏着中国的民族之魂——延安精神，令世人瞩目，万代敬仰。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红军、老八路想起延安精神，昔日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使他们思绪万千，心潮澎湃；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年人、青年人说起延安精神，史诗般的革命画卷浮现在眼前，使他们心驰神往，激情满怀。人们抚今追昔，心愿共著：时代需要延安精神！人民呼唤延安精神！

提起延安精神，自然会令人想起我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是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起，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转向华北止。这期间，党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领导中国革命，前后历经12年5个月26天，习惯上叫“陕北13年”，史称“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个方面都有伟大建树的时期。在

28年的民主革命中，后15年（1935——1949年）即遵义会议以后，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历史过程，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有13个春秋属于延安时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员不过3万，根据地仅存一处，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当党中央离开这片黄土地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即将结束，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即将诞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来说，延安时期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党员队伍由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且在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一时期更加系统化和普及化了。中国共产党已经锤炼成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通过全党的集体奋斗，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的总结而达到成熟。

正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延安精神。就其实质而言，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她包含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科学精神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压、不信邪的大无畏精神等丰富内容。延安精神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革命

人生观、世界观的生动体现。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努力实践和倡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先进的民族精神。几十年来，延安精神不仅教育和鼓舞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而且培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共和国卫士”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发扬延安精神，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将始终面临着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面临着和平环境的考验。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我们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不懈，这就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国庆四十周年前夕，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延安时强调指出：“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学习延安精神，弘扬延安精神，是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有力保证。延安精神，必将照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历程，照耀中华大地的千秋万代！

《延安岁月》是一本以宣传延安精神为主旨的纪实性读物。作者从教学的需要出发，通过延安时期的重大决策、革命旧址、领袖轶事、“四八”烈士等历史情况的介绍，力求再现延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和时代风貌。该书在叙述方法

上尽量做到既适合于实地参观学习使用，又能够作为学习延安精神的通俗教材。无论是到过延安的人或没有到过延安的人，都可以从本书中进一步了解延安精神的真谛。我衷心希望，我们大家以实际行动宣传延安精神、实践延安精神，使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1990年2月

目 录

时代需要延安精神，人民呼唤延安精神（代序） 陆 恂	
决策：通向胜利之路……………	（ 1 ）
一、化干戈为玉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 ）
二、创办“窑洞大学”，造就一代英才……………	（ 9 ）
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22 ）
四、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	（ 31 ）
五、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伟大的里程碑……………	（ 38 ）
六、顺应时代潮流，争取和平民主……………	（ 44 ）
七、敢打必胜，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	（ 55 ）
八、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 59 ）
故居：历史的见证……………	（ 66 ）
一、凤凰山——初到延安的落脚地……………	（ 66 ）
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 75 ）
二、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	（ 86 ）
三、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	（ 102 ）
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	（ 114 ）
四、王家坪——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 122 ）
领袖轶事：细微之处见精神……………	（ 139 ）
一、艰苦奋斗……………	（ 139 ）

二、严于律己·····	(146)
三、革命胸怀·····	(156)
四、关心群众·····	(162)
“四八”烈士：时代的英雄·····	(171)
一、“四八”蒙难·····	(171)
二、烈士生平·····	(176)
三、举国哀悼·····	(187)
四、战友情深·····	(192)
五、烈士陵园的变迁·····	(196)
附：延安烈士陵园其他烈士简介·····	(198)
延安精神，革命的传家宝·····	(201)
一、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201)
二、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206)
附 录	
一、延安概况·····	(212)
二、黄陵简介·····	(215)

决策：通向胜利之路

中共中央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在这里度过13个春秋。这段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在中国这个大舞台导演了一幕幕雄伟壮观的历史剧。

一、化干戈为玉帛，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那生死攸关的岁月。

1931年，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旋涡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危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霸中国的野心，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久，我东北三省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便沦入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3000万同胞遭到蹂躏，丰富的宝藏资源遭到掠夺。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进一步扩大了侵华战争。到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策划了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

然而，在这危急关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竟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投降政策，

先是命令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继而又同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等。另一方面对内则奉行内战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大打出手，围追堵截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使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倒在血泊之中。内战，更加重了民族的危机！

在这个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郑重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尽管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党同国民党有10年血战的历史，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但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乃以豁达大度的胸怀，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2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途经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以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实现对日作战。但在山西境内，却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拦击。同时，蒋介石还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我陕北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更大的冲突，红军在回击取得胜利后，便主动撤回河西，并于5月5日发表了“回师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提出重建两党合作关系，并相应地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但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非但不改弦更张，反而亲临西安督

战，继续“剿共”。即便如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采取了十分理智的态度。当时，蒋介石是人心大丧，国内一片杀蒋呼声。16日，西安10万人集会，通过了“拥护张、杨救国宣言”，要求杀蒋以谢国人。但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之大义，为避免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以使事变成为走向国内和平的契机，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于17日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与蒋介石的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经过谈判和斗争，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为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国民党政府改变其反动政策，转向抗日和民主，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不久，便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我党也作了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提出了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我党的这一政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

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了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使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随后，为实现国共合作，中共又派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了人民的立场，在原则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又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就某些问题尽可能作了适度的让步，以表明我们党合作的诚意。

第一次谈判于2月中旬至3月中旬在西安举行。我党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的主题是红军的改编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政权建制问题。关于红军改编问题，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调解谈判中，周恩来就曾向蒋介石表示，红军愿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改称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导。这次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红军编4个师16个团及2个工兵师，计6万人（当时红军在陕甘宁地区兵力实为7.4万人）。国民党方面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开始提出红军不能设师的编制，只能编3个团。谈判期间（2月16日），蒋介石发来“密令”，顾祝同等即以“密令”为旨，坚持红军只能编2师8个团。在双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为谋求国共合作抗战的前途，我党代表提出了让步方案：照中央国防师每师1.5万人编制，红军主力编为3个师，即6旅12团，共4.5万人。红军改编后，原领导不变，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但蒋介石又为此指令顾祝同：改编后的红军“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几经争辩，顾祝同等最后同意红军的编制、数额，但不接受

设总指挥部，并坚持红军的管理教育属国民党行营。关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称及其人员任命问题，中共代表建议，为便于联合抗日，红军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可更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改变现有的苏维埃制度，特区行政上受南京政府指导，机关行政人员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推荐给南京政府统一任命。对此，国民党代表起初提出边区政府的主要职务由国民党派员担任，后来又提出，不仅边区政府属国民党领导，而且连共产党也要服从国民党领导；红军必须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军政人员须由南京政府统一调遣，陕甘宁边区只能改为地方行政区，隶属各省国民党政府领导。由于国民党代表提出的意见，旨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完全失去国共两党平等谈判、团结合作的诚意，致使谈判中断。为了谋求转机，周恩来于3月12日提出要同蒋介石直接会谈。

3月间，周恩来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陪同抵杭州，与蒋介石、张冲等进行第二次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红军编3个师，其领导人不变，陕甘宁边区保持其行政区的独立与完整，边区政府人员推荐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郭洪涛、高岗、张冲（国民党官员）、杜斌丞（民主人士）9人组成。周恩来郑重指出，希望国民党方面诚心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开放民主，改善民主。国民党果能如此去做，共产党可以拥蒋抗日。但蒋介石虽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却回避谈判应解决的具体问题。他提出不必提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个人合作，要求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方案来。并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诸如边区独立、红军人数等问

题均好商量。周恩来明确指出，保证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适当的组织形式，以此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对此无异议，表示让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然后再谈。

这次会谈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共同纲领”及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的意见，草拟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6月4日，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在庐山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时，蒋介石既闭口不谈“共同纲领”，又反对我党提出的两党合作（建立民族联盟或实行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他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应首先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该会由他指定国民党人士若干与共产党提出的同等数额人员组成，他任主席，凡事他均有最后决定之权；红军改编问题，同意编为3个师，12个团，4.5万人，但坚持从师到连各级副职均由国民党派员充任，并否认在杭州同意红军成立总指挥部的诺言，提出在3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红军，“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离开红军”，陕甘宁边区政府要由国民党人士任正职，副职可以由林伯渠担任。蒋介石关于“国民革命同盟会”等主张，实际是要实现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欲望。对此，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共同纲领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只有先认定纲领，才便于商谈组织形式，包括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等问题。目下是国共两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向国民党投诚，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为了谋求平等合作抗日的条件，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对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绝对领导。这次谈判仍未达成协议。